

冯友兰和克尔凯郭尔的人生境界说比较^{*}

马亚男

(北京大学哲学系, 北京 100871)

摘 要:冯友兰宣扬儒家哲学的人格修养,并提出哲学的功用就在于取代宗教,而克尔凯郭尔提倡的是人对宗教的皈依,让人虔诚地信仰和不断地选择。

关键词:冯友兰;克尔凯郭尔;人生境界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冯友兰和克尔凯郭尔,一位是现代中国哲学家,一位是丹麦的宗教哲学家;一个出生在19世纪末,一个出生在19世纪上半叶;一个出身书香门第,一个出身商贾之家。在这样迥异的时代、文化背景和生活环境下,两位思想家都在人的生存方式和存在状态的问题上建构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他们的人生境界说不仅有融通处,也有差异处。通过比较研究,我们不难看出两位哲学家的人生境界说具有很强的可比性。例如:他们都看到了每个人生存状态的多样性、反复性以及人生存状态的非线性跃迁,都看到了感性与理性、义与利的矛盾并力图予以整合等等。当然,二者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二者人生境界说概述

冯友兰在吸收维也纳学派逻辑分析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传统儒道固有的负的方法,建立了新理学的形上学。并在《新原人》一书中阐释了其著名的人生境界说。

冯友兰认为,由于主体的差异,每个人对宇宙人生的觉解程度各不相同,但大致可有四类人生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的人具有较低的觉解,其行为是“顺才”或“顺习”的,觉解把他们和动物区别开来,而他们却没有自觉的主体性,不能“觉解其觉解”;功利境界中的人亦不能“觉解其觉解”,其行为是求利的,唯利是图的;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中的人则能“觉解其觉解”,但前者是“求义”的,后者是超义利、超荣辱、自通于大全的。四个境界的觉解由低到高,从历史的横断面看,不同的人属于不同的境界,而就单个人而言,其一生当中要实现人生境界的跃迁,但却不一定按此四个境界由低到高。

克尔凯郭尔是19世纪上半叶活动于丹麦的思想家。由于其理论后来成了存在主义的重要理论来源,因而作为存在主义的先驱享誉西方哲学界。其在《或此或彼》《人生道路诸阶段》等书中提出了其关于人生境界的思想。

^{*} 本文经由北京大学哲学系胡军教授指导并推荐。

收稿日期:2002—10—20

作者简介:马亚男(1979—),女,黑龙江绥化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克尔凯郭尔认为,人在通向上帝、成为自我的过程中,可能有三种不同的存在方式或存在状态,他称之为“生活道路诸阶段”,即审美阶段、伦理阶段和宗教阶段。所谓“阶段”,同冯友兰一样,不是指三个阶段由低到高的线性跃迁,因此有些学者主张用“境界”代替“阶段”。我们这里为区别冯友兰的“境界”,姑且沿用“阶段”一词。审美阶段的特点是人的生活为感觉、冲动和情感所支配,个人沉溺于感性的享乐生活。不追求确定的信念,不遵循固定的和普遍的原则和规范。到头来此阶段的人必因不能长久满足享乐或因满足后的空虚而陷入绝望;伦理阶段的特点是人的生活为理性所支配,能倾听理性的呼声,克制自己的情欲,将个人的所欲与社会的义务相结合,遵守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准则和义务,但往往由于经受不住感性享乐的引诱而犯错,当人的内心意识到自己不能圆满地履行道德义务而有犯罪感并感到绝望时,个体就会跳向宗教阶段;宗教阶段的特点是生活为信仰所支配,人不仅摆脱了物质的世俗的诱惑,而且摆脱了一切道德原则的羁绊,人只是作为他自己而存在,所面对的只是上帝。

二者人生境界说的异同

第一,从相异处来看,克尔凯郭尔的理论体系中少了一个自然境界,而冯友兰则认为原始人、愚人、婴儿和文明社会中的一些“莫知其然而然”的现代人都是自然境界中的人,这个境界中的人生活通常千篇一律,不自知,虽有自我意识以区别于动物,却没有自觉的主体性,没有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的统一。这样的状态是人的存在的原始完满状态,但遗憾的是,其中的人不自知。从相同之处来看,克尔凯郭尔的审美阶段与冯友兰的功利境界的类同。“克尔凯郭尔并不是在传统的意义上使用‘美学’的概念以及与之相应的‘美学的’一词的,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赋予它们一种新的含义,即用它们表示和界定人的生存态度或生存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的存在的某一特定阶段或层面(层次)”^①。克尔凯郭尔称此层面是人的存在的最低层面,存在于美学层面的人意识不到自己的本质是一个“综合”(克尔凯郭尔语)。冯友兰的功利境界亦是人存在的较低层面。因此此境界中的人不能“觉解其觉解”,对人的本质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用冯友兰的话说是

在“梦觉关梦的一边”。可以说,无论是审美阶段还是功利境界,其中人的生活都为感性欲望支配,而为自为私的,拒绝公共的普遍的规范和准则。

第二,具体说却有如下区别,克尔凯郭尔看到美学层面的最一般的特征就是对感性快乐的追求,并将美学层面划分为两个具体的层面:直接性的层面和反思性的层面。直接性层面中的人听凭自然欲望的摆布,其唯一的生活目标就是追求最大限度的快乐;反思性层面中的人生活以无限、可能、自由、永恒等因素为主导。而冯友兰功利境界中的人,尽管同克尔凯郭尔美学层面中的人一样,其生活受感性欲望支配,但这种感性欲望特指私欲,因此范围相对狭小。冯友兰指出“此境界中的人,其行为可以是有万种不同,但其最后底目的,总是为他自己的利。”^②冯友兰进一步提出了功利境界中代表性底行为方式:英雄和奸雄。“以其不道德底行为,达到其利己的目的,以成其利己的成就者,谓之奸雄。”^③而英雄行事则是利己又不损人的。克尔凯郭尔在审美阶段的反思性层面表达了人的一种无家可归的绝望,而冯友兰在功利境界的英雄的行事方式这里,表达了人自己对道德理性的依赖和对归属的渴望。由此可以看出东西文化底蕴的差异:一个表达了人的一种“被抛”状态,一个给人以确定性。

第三,克尔凯郭尔的伦理阶段与冯友兰的道德境界的异同。克尔凯郭尔把伦理阶段中的人称之为具有义务感和责任心的公民,把履行伦理义务和责任视为自己存在的目标,其使命就是使自己的行为合乎规范,使自己成为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人;而冯友兰描述的道德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行义”的,是求社会的利的行为,亦是使自己的感性受到道德理性的规范。无论是冯友兰还是克尔凯郭尔都强调把个人所欲与社会义务相结合。冯友兰指出:“在道德境界中底人,知人必于所谓‘全’中,始能依其性发展。社会与个人,并不是对立底。离开社会而独立存在底个人,是有些哲学家底虚构悬想。人不但须在社会中始能存在,并且须在社会中始得完全。”^④而克尔凯郭尔笔下的伦理主义者是一个调和主义者,他们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存在本质是一个“综合”,在克尔凯郭尔看来,在存在的审美阶段通往宗教阶段的过程中,无法存在一个调和点,因为它们是绝对的非此即彼,伦理阶段只是一个通向宗教阶段的过渡性层面。普遍的理想是空泛的,普遍的道德亦是虚伪

的,往往造成对个体人的压抑和个性的泯灭,个人又恰恰不能摆脱世俗的感性生活,容易受到美学阶段生活方式的引诱而忘却道德义务,伦理主义者永远处于可能重新陷入审美阶段的危险之中。因此伦理阶段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层面,它不能成为人的整个存在的根基,除非进入存在的宗教层面。克尔凯郭尔看到了伦理层面无法克服的矛盾,克尔凯郭尔认为真正的道德只有在宗教中才能实现,而冯友兰则不然,他总是将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看成是人应追求的境界,对道德境界持肯定态度。

第四,克尔凯郭尔的宗教阶段和冯友兰的天地境界的异同。宗教阶段和天地境界分别是克尔凯郭尔和冯友兰人的存在的最高阶段,只有在这样的存在方式中,人才能实现自我的本真存在,人才能实现人之为人的最高标准,克尔凯郭尔称这种理想人格为“孤独的个体”(基督徒),冯友兰称之为“圣人”。他们对于人的存在的本真状态都有各自详细的描述。克尔凯郭尔在《致死之疾病》一书中写道:“人是无限与有限、永恒与暂时、自由与必然的综合,总之,人是一个综合。”^⑤而冯友兰则在《新原人》一书中描述了一幅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统一的图景。克尔凯郭尔指出,人的这种本真的“综合”是由上帝设定的,而冯友兰指出:人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人之理”本然如此。

从实现理想人生境界的过程来看,无论是冯友兰的人生四境界还是克尔凯郭尔的人生道路的三阶段,都经历了感性欲望—理性自觉—超越的境界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不是按照人生的各个境界依次跳跃,而是在总体上而言不可或缺的理论环节,个体人的人生境界发展充满着各种可能。两位思想家都看到了这种人的存在的本真状态不是一种既成的状态,而是一个动态的生成过程。在实现理想人生境界的过程中,他们还都认识到人生境界的跃迁不是轻而易举就可完成的,而是存在着反复与退步。克尔凯郭尔认为,成为基督徒的任务并不是通过一次性的跳跃而完成的,因为人总是处于重新堕入更低阶段的危险之中,只有通过不断重复的选择,才能无限趋近基督的本质;冯友兰的论述与克尔凯郭尔可谓惊人的接近,在《新原人》一书中冯友兰指出,哲学可以使人达到天地境界,但“不能使人常住于天地境界。欲常住于天地境界,则人须如此底哲学底觉解‘以诚敬存之’。”^⑥

从实现理想人生境界的途径来看,在克尔凯郭尔看来,作为一个孤独的个体的任务就是成为基督徒,效仿基督徒是孤独的个体一生的任务,通过对基督信仰,每个人都能成为永恒与暂时的综合,信仰是惟一的途径,基督是暂时与永恒的完满综合。伦理主义者调和的失败就在于他没有同上帝发生关系;而冯友兰则强调通过修养,提高人的觉解,人人都有成圣的可能,因为“人既然是人,则尽人之性,不能不说是一种自然发展。”^⑦冯友兰指出,哲学“能使人知天,可以使人到天地境界”^⑧,但其理想人格不是基督徒,而是圣人。

启示

通过比较分析,得出几点结论,以供思考:

哲学与宗教可以具有相同的社会功能。无论是哲学还是宗教,在终极关怀的意义上,都可以给人一种归属感。从这种意义上讲,宗教在本质上是和哲学相通的。他们都是人类在迷失精神家园的状态中,指引着人类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去寻找人类精神的家园,只不过宗教把这种理想断然地置于彼岸世界。但哲学毕竟不同于宗教,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诉诸理性的反思活动,宗教则依赖人们的信仰。中西哲学家思想的差异是文化差异的一面镜子。无论是东方的儒道佛,还是西方的基督教文化,都要为人的存在提供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克尔凯郭尔提倡的是人对宗教的皈依,让人虔诚地信仰和不断地选择;冯友兰却宣扬儒家哲学的人格修养,并提出哲学的功用就在于取代宗教。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冯友兰的人生境界说自始至终都给人一种确定性和归属感;而克尔凯郭尔的人生哲学虽以信仰上帝为依归,却反映出西方社会中人的一种“被抛”状态和精神上无家可归的境遇,他们都在各自的体系内人为地设定了一个理想人格的标准,然而,一个是儒家的圣人,一个是皈依上帝的基督徒。

①王平:《生的抉择》,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60页。②③④⑥⑦⑧冯友兰:《贞元六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55、598、556、661、650、661页。⑤Soren Aabye Kierkegaard: *The Sickness into Death*. Translated by Howard V. Hong and Edna H. Hon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p13.

责任编辑:成一